

余国耀 著

求實集

經濟日報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沂滨 朱 兰

责任校对：赵 静 何 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求实集/余国耀著.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6. 1

ISBN 7-80127-074-6

I. 求… I. 余… II. 农村经济-经济改革-研究-中国-文集
IV. F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062 号

求 实 集

余国耀 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4.75 印张 380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80127-074-6/F·30 定价: 28.00 元

谨将此书献给处于改革大潮中的九亿中国农民以及广大农村干部，他们正在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XAG50/Z.



作者 1986 年摄于深圳梅园

作者简介

余国耀，祖籍广东普宁流沙，1931 年出生于揭阳埔田。1949 年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是我国农村问题专家。

1978 年起，自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来京工作，先后曾任农业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牧渔业部宣传司司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局长，现任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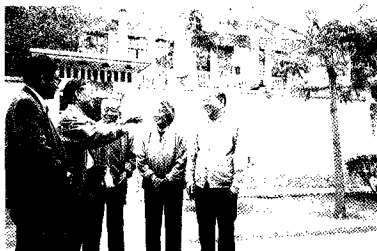
作者曾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多年，“文革”期间下放煤矿工作、1985—1986 年兼任国务院特区办研究室副主任。



1980年6月，作者（前站右一）随农业部长霍士廉（前站右二），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前站右三）、农业部副部长赵修（二排中）到湖南、贵州调查研究包产到户问题。合影于娄山关。



1992年4月，作者到山西调查研究中西部乡镇企业问题，与大寨支部书记郭风莲合影于大寨虎头山。



1994年4月，作者访问河南刘庄，在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刘庄支部书记史来贺（右）陪同下，同农民探讨农村发展道路问题，访问结束后，与主人告别时情景。

1987年10月，作者到陕西调查研究农村改革问题，与陕西副省长徐山林（右）合影于《止园》（杨虎城将军公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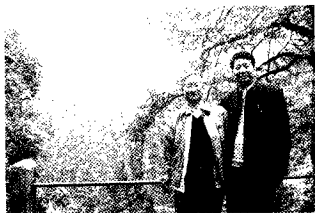
1992年7月，作者到长江上游的四川省阿坝、凉山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四川民委李伟辉、敖泽普等同志合写《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吗？》一文。这是作者与凉山彝族姑娘合影。



1988年9月，作者到内蒙锡林浩特市郊调查牧民生产、生活情况。在蒙古包前与牧民全家合影。



1991年4月，作者到湖南、江西调查研究农产品流通问题，与江西省副省长舒惠国合影于井冈山。（上图）



1992年—1994年，作者与广东省农委副主任江惠生多次到深圳宝安县（区）万丰村，对农村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作调查研究，两人合影于万丰第二合作社。（中国）



1995年7月，作者和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所长陈吉元（左一）、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会副秘书长周德中（右一）到粤西地区考察“三高”农业，与信宜县县委书记黄福泰（左二）、县长陈日昌（右三）合影于池洞芒果园林。（下图）





1978年5月，作者随谷牧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与农林部部长张根生合影于丹麦哥本哈根。

1992年9月，作者访问汕头经济特区，与市委书记林兴胜（右一）、市长吴波（右二）、源兴国际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揭理市政协常委林兴识（左一）合影。



1994年11月，作者应邀出席在广东省东莞市召开的中国东部农村市场经济与现代农业发展研讨会。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农科院原副院长刘志澄（中）、辽宁农业大学校长朱遵华（左）合影。

内容简介



3 0084 3426 2

本书主要内容是作者多年从事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文集。由于作者长期以来在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和中央、国务院研究部门工作，对我国农村这场伟大的改革有较全面和连贯的了解，反映的内容丰富、翔实，视野开阔，文风朴实。

收进集子的《怎样看包产到户》、《略论农村专业户》、《稳定完善农村联产承包制》、《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是群众的愿望》、《怎样理解新的历史时期发展集体经济的任务》等文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时，都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其中有的曾经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具有决策参考价值，是研究我国农村改革的可贵资料。而在《农业家庭经营与现代化生产》、《我国农业家庭经营和家庭经济》两文中作者所阐述的观点，则是被认为“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家庭经营是能够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论点”，和对“家庭承包制是我国农村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的具有说服力的阐述。经过十多年来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检验，上述观点经受住了来自“左”的传统观念的挑战，已被现实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股份合作制：模式不宜单一》和《粤西区域化“三高”农业之路》两篇文章，针对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作者着重从党的农村基本政策进行阐述，回答了现实中提出的问题。

这本书收集的主要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从1980年到1995年，文章内容的展开以及发表的时间是与我国农村新进行的这场伟大改革同步的。从《怎样看包产到户》（1980年发表，这是中央报上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个人署名文章）到《农村股份合作制：模式不宜单一》（1994年）；从《关于“以粮为纲”》（1980



C

391186

年)到《粤西区域化“三高”农业之路》(1995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过程中的每个关键时刻,由于作者能敏锐地抓住农村改革这个重大主题,满腔热情地赞颂农民在改革过程中的伟大创造,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自己对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的认识和体会。因此,本书适应于广大农村干部、特别是那些没有机会从一开始就亲身经历这场伟大变革的青年干部阅读。它不仅有助于读者对农村这场伟大改革全过程的历史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对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精神实质的认识,提高贯彻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文集收进的作者在国外讲学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发表的论文、讲稿,有助于读者多角度、多层面地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和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

文集中《我国沿海十四个城市开放后深圳特区地位再认识》一文,在《经济日报》上发表后,曾被海内外多家报刊转载评述,引起较大的反响。

本集子阅读对象除了适应于农村干部和从事经济政策研究的人员,对广大读者也有丰富多彩的篇章,如“绚丽的‘长白林海’”、“西双版纳毁灭之火为什么越烧越严重”、“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吗?”以及“河西走廊土地开发潜力的调查”等,均足以发人深思,激发人们爱我中华大地山河的情感。

序 言

杜润生

余国耀同志和我相处已经十几年时间,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村工作。在工作中他曾给我留下一种深刻印象:重视实际,敢说实话,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难得的风格。一个人具有这种风格才能做到勇于追求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也方能培育出观察事物、研究问题的科学精神。

国耀同志重实际,讲实话的风格,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引起更多同志注目的是在农村改革事业中,如何对待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稳定。家庭承包制是由包产到户演变而来的地权体制。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这种体制,曾引发过几起几落的争论。最初本是农民的自发行动,目的是用它去替代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统一经营。农民这个主张的合理性,早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已为一些县级以至更高级领导同志所承认,并支持在一些地区试行,不料,这些同志却因此而受到批判,被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别说倡导包产到户,就是说几句赞同的话都会冒很大政治风险。可是历史偏偏出现戏剧性变化,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恰好在这个方面找到了转变的突破口。实际上,所以产生这种变化,乃是全国从农民群众到最高领导人在实践中集体学习而得出的结果。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人都保持一致见解,出于种种原因,反对这政策的人准会有的。事实上,就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将近十年,在农村生产发展状况业已证明其可行性之后,也曾一度出现不算小的反对声浪。此时,有一些支持包产到户的同志也顺风转舵附和了反对者。余国耀同志此时能深入民间,倾听群众呼声,传送给领导机关一个讯息:

“农民怕变”、“呼唤政策稳定”，它和来自各方的反映一起，引起领导重视并做出正确决策。

邓小平同志曾讲，农村有两个飞跃：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是一次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将来还有一个飞跃，是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领会小平同志这个讲话，绝不可忽略下边这个涵义：第二个飞跃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绝不是简单复原过去已经废除的形式。小平同志所以强调家庭承包制“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很长的过程”，其意义就是需要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让农户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自主决策，独立经营，发展商品生产。此时的农户经济是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主宰与依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否定。本来，新中国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已经把这种关系彻底扫除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是，土改之后，由于在经济条件尚未发育成熟的时候，就用几年时间全面地实现公社化和统购统销制度，并对农民个体经营和市场商品交换也同时予以废除，结果商品生产受到抑制，未能实现原来高度发展生产力的预期，而后者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确立和巩固的必要条件。因而，在80年代发起了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事业。以往的历史发展昭示人们：社会制度的变迁是不会停止的。农村改革，恢复了家庭经营，必须长期保持稳定。但家庭的经济功能，一定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出现分解和变化。主张家庭经营拥有独立自主权利，决非倡导孤立化经营，固守小农自然经济。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农业经营方式，一定是既有分散又有联合，其具体组合形式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由群众去探索，去创造，去选择。党的指导是不可缺少的，但不能违反客观经济发展法则和群众愿望，凭主观偏好办事。

遵国耀同志嘱，为他出版文集作序，临纸思索，不知写什么好，谨记录几句想要说的话，作为回应。

回顾与认识

——我的社会经济研究与学术实践

我国农村实行改革以来，到现在已经 17 个年头了。这期间，我在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一些农村调查报告、政策研究文章和建议，现收进这个集子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给集子起名叫《求实集》。

我是 1978 年从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调表国家农林部工作的。后随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变动，撤农林部，恢复农业部，转又改名农牧渔业部。1986 年，我离开农牧渔业部，调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农研室同时挂的另一个牌子叫“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9 年，国务院研究室成立，我被调表这里工作，直至今。近二十年来，我的工作岗位虽几度变动，但都没有离开农村调查和政策研究这条主线。由于我长期工作在国家农业主管部门和中央、国务院研究部门，这就使我有幸对我国农村这场伟大改革有一个较为全面和连贯的了解，为我的农村调查和政策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次《求实集》一书结集出版，对我个人来说，我把这作为自己参与农村这场伟大变革的历史回顾和总结，同时，这集子里的一些文章，由于记录和保存了这场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的不同思想认识，我把它作为“历史资料”提供给读者“参考”，它是不是有价值呢？只能由读者自己作结论。

（一）

回顾 17 年来，我的社会经济政策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实践告诉

我，做一名政策研究人员，起码的条件就是从实际出发，敢于直言，讲真话，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我亲身有过这样的经历：1989年11月11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刚开过，我和同室的一位同志来到江苏、安徽农村调查。这时北京“六四”风波虽已平息，但农村中一些人的政治思想仍处于动荡之中。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左”的思想苗头，有的地方新出台的农村政策措施，走的是“回头路”。农村改革向何处去？一时间，“群众怕变”（担心走回头路）、“干部恐右”（由于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压力，他们害怕以家庭承包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但内心实际是怕过去“左”的一套政策重来）成为这个时期的普遍心态。当我们来到以大包干闻名全国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时，村长（原生产队长）严俊昌和干部严宏昌向我们坦露了对农村局势的忧虑，严俊昌说：“天安门事件后我们农民心里日夜不安哪！我们农民现在最怕的是江泽民又要搞毛主席老人家一大二公那一套！”听完严俊昌这句话，我们深感不安。在我们离村返县城的归途时，已是暮色苍茫，严俊昌和严宏昌脸色严峻，他们心里虽有千言万语，这时却不多说，不急于和我们告别，而是送我们一程又一程。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归京后，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们立即把农村情况向上反映。我们是11月21日返到北京，11月24日写好“报告”送上去，12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便发表了意见，他在怀仁堂听取“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议”的汇报会上，向参加会议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负责同志讲话时说：“农民担心政策变，安徽农民说担心江泽民搞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大二公那一套，这使我深思，我查阅了我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有关讲话，我们的讲话和政策是不是有引起农民疑虑的……。今天我在这里宣布，我主张8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会变，包产到户的政策不会变。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和部门，要明确地宣传

稳定政策，宣传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变，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江泽民总书记这一席话，很快地在全党、全国传开，农民安下心来。严俊昌和严宏昌他们听到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家庭承包制政策不变的话，也和全国农民一样吃了“定心丸”。1990年2月11日，严宏昌给当年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支持小岗村大包干改革、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写了一封长信，向党倾诉了肺腑之言，表达了小岗村农民对党和邓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与拥戴。他在信中再次提起我们那次到小岗村调查的往事，对我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备加赞扬，信中说：“最感人心的是，你们派下调查组到农村，如余局长……来，给我们带来了党中央的话，我们在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又安下了心。”（原信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摘要》1990年第28期。题目是《一位曾是承包主事农民讲的心里话——凤阳县农民严宏昌给万里委员长的一封信》）读着严宏昌的信，我再次受到深刻的教育：作为一名农村政策研究人员，党和农民是多么希望于我们工作中做到如实地、及时地反映情况啊！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桩事。事后，我思索再三，小岗村长说的话实在太“刺耳”了。通常我们各级机关向上级反映问题时，象这样的“原话”很难“如实”上报。我们这次能“保留”原话上报，是由于一种“超常”的情况使然。否则，达一句“刺激性”很大的话是到不了总书记那里去的。江总书记关于家庭承包制政策不会变的话，正是从小岗村长的这一句话讲起，引伸开来的。（本书收集的198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是群众的愿望》一文，就是该报告改写成的）

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直言，敢于讲真话，虽然是我们党一条重要的思想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容易做到的。达不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有个人的因素，更有客观因素如“一言堂”的影响仍然存在等。在这里，我不想展开说。我

要想讲的是，是当一名政策研究人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它要求当事人应具有实事求是、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风格。前述我们向中央反映小岗村长的话，可以说，是我鼓足“勇气”承担风险的一次表现。它来自对农民存在着严重怕变的不安心理的同感与对农村改革前途的焦虑。其结果这桩“情况反映”引起如此良好的、巨大的政治效应，却是表原表没有想到的。表和广大农民一样安心下来了，也为自己做了份内应做的事感到无比宽慰。我们在凤阳小岗村调查时，安徽滁县地委（凤阳县隶属滁县地区）书记、现任安徽省人大副主任陆子修同志，曾陪我到表民家里访问，他是一位颇有点名气的地方农村改革开放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当时农村局势的看法，我们的观点较为一致。表返京后，他在1990年1月3日给表写来一信说，“表们相见时间短暂，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如实反映情况，……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感谢。”陆子修同志的话，既是对自己的鼓励，又是对自己的鞭策。

（二）

读者从这个集子可以看出，这些年我整个农村调查和政策研究的内容，贯穿着农业家庭经营与现代化生产这个主题。首先是这类稿子占文集篇章较多。从1980年起到1995年，时间跨度较长；其次是，从《怎样看包产到户》到《关于深化农村改革重点的问题》，我几乎是一以贯之地站在家庭承包制的立场上，同每个不同时期的各种分歧的观点展开针对性论争。我写出和发表这一系列的稿子付出的心血，是值得的。

为了帮助读者多了解一点这本文集“出笼”的历史背景，我想选择其中的三几篇略加说明。

“让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